

王中立慧眼识英才

□赵德荣

莺儿燕子俱黄土。千秋万古，为留待骚人，狂歌痛饮，来访雁丘处。”

此词情真意切，哀婉缠绵，尤其开篇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！”之句，如金石掷地振聋发聩，成为咏叹爱情的千古绝唱。词作传出后，崇尚豪放诗风的王中立读罢，不禁击节赞叹，深为这位少年才俊的才情所折服，当即提笔写下《题裕之乐府后》一诗，诗曰：“常恨小山无后身，元郎乐府更清新。红裙婢子那能晓，送与凌烟阁上人。”“裕之”即元好问的字，王中立认为寻常考官难以理解元好问文章中的深意，只有“凌烟阁上人”方能真正读懂。这一评价既彰显了王中立卓越的文学鉴赏力，更体现了他奖掖后进、慧眼识珠的开阔胸怀。

赵秉文为金大定年间进士，诗文书画俱精，名重一时。他在岢岚任职期间，结识布衣王中立，二人因诗相知，结为唱和往来的挚友。后来赵秉文出任平定州刺史时，王中立特意将元好问的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及自作《题裕之乐府后》一并示于赵秉文。这让赵秉文对素未谋面的元好问产生了极佳的印象，也为日后元好问在文坛崛起埋下了重要伏笔。金宣宗贞祐年间，元好问赴汴京应试，虽未登第，却得以结交京中名流。当其诗作传至礼部尚书赵秉文手中时，赵氏惊叹“近代无此作也”，元好问由此“名震京师”。这一局面的形成，固然源于元好问自身的绝世才华，但王中立早年极力推荐无疑起到了关键的铺垫作用。

王中立与元好问之间，不仅有知遇之恩，更存在文学上的师承渊源。《中州集》载，元好问曾亲向王中立请教作诗之法，王中立以秦观的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”为例，评析此句虽工致精巧，但比起韩愈的“升堂坐阶新雨足，芭蕉叶大栀子肥”，则“如妇人软语”。王中立推崇阳刚豪迈、清新自然的诗风，这深刻影响了元好问的文学观念，他在《论诗三十首》中云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。拈出退之山石句，始知渠是女郎诗”，便是对王中立诗学观点的呼应与阐发。名臣徐世隆评价元好问“诗祖李、杜，律切精深，而有豪放迈往之气”，可见王中立的诗学思想经由元好问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。

王中立的个性与才情令赵秉文十分钦佩，赵秉文在《水调歌头·四明有狂客》序中记载，王中立曾赠诗于他，诗云“寄与闲闲傲浪仙，狂随诗酒望无缘。黄尘遮断来时路，不到蓬山五百年”，意趣超逸，不染尘俗。赵秉文遂在词中将其比作唐代“四明狂客”贺知章，誉之为“谪仙人”。王中立言行素来豪放不羁，曾于赵府中秋宴上赋诗“印透山河影，照



开天地心。人世有昏晓，我未尝古今”，令赵秉文击节称奇；又挥毫写下“龟鹤”大字，笔意苍劲，且自题云“天地之间一古儒，醒来不记醉中书。旁人错比神仙字，只恐神仙字不如”。其风骨气节，恰如赵秉文所言之“狂客”，亦合元好问笔下“异人”之评。

赵秉文在岢岚任职期间，曾作《岢岚赋雪分韵得素字》一诗：“闭门三日雪，荒城甚无趣。土屋多半颓，鸡犬迷牖户。云端高青荧，天色易晚暮。寒迷日车辙，清绝坤维柱。”诗句情真意切，既状写了边地雪景的苍茫，也流露出作者对岢岚这片土地及其间人物的深厚情感。据《续夷志》载，王中立去世后，时任镇西军节度使（治所驻岢岚）的石伦将其安葬于今忻州境内。

王中立集隐士、狂者、诗人、鉴赏家于一身。他淡泊名利，却对文学怀揣炽热追求与精辟见解；他自甘隐居避世，却以远见卓识，向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赵秉文极力推介青年元好问，并在诗学理念上深刻影响后者。在元好问从才华横溢的青年成长为一代文宗的历程中，王中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伯乐与导师。他的慧眼不仅识得英才，更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这位英才的文学品格，从而在金元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。

书香一品

青少年心理健康，牵动着家庭、学校与社会的神经。青少年为心理健康高风险群体，作家梁鸿用三年多时间走近那些被情绪问题困住的孩子，走近家长、教师、精神科医生、心理咨询师，写下了交织着人文温度与现实重量的非虚构新作《要有光》（中信出版社出版）。

该书以北京、滨海、丹县三地为本，兼顾了超大城市、中等城市、县城乡镇的不同光谱。经由作者细腻讲述，我们会发现，青少年心理问题往往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结果。有的是原生家庭的情感疏离将孩子推入深渊，有的是教育竞争的内卷把家庭拖入焦虑漩涡。作者变换叙事视角呈现孩子的内心世界，用对话、日记、特写等多元文体为每个人留出倾诉的空间，用文学的方式让数据变得有血有肉，让情绪变得真切可感。

《要有光》在直面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同时，也引发我们对养育与教育的思考。曾经带给许多70后、80后父母梦想与荣光的求学路，何以成为下一代过不去的坎？作者用大量真实案例让读者意识到，如果把培养孩子变成一场场通关升级，把成绩视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，那么这些最终都会化为压在孩子头顶的如山重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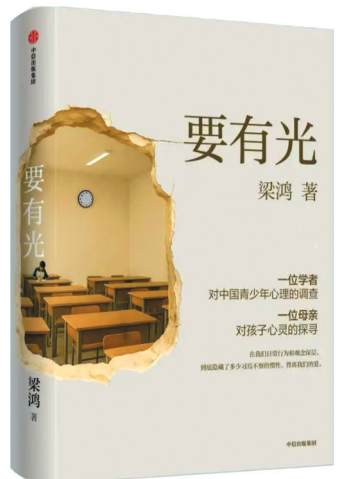
如书名所示，《要有光》一书执着地寻找光、看见光。“光”来自专业的坚守，在乡村学校推广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、专门向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敞开大门的辅导班“奶爸”，用共情的聆听缓解青少年精神压力的医师，他们都在努力帮孩子们重建秩序。“光”来自亲人的坚韧，母亲的身影一直陪伴在孩子左右，与他们并肩走出阴霾。“光”更来自孩子们，他们在低谷与困境中依然保有对生命的热爱，有的孩子痊愈后选择攻读心理学专业，有的孩子重返校园、继续学业，有的孩子融入社会重拾生命的尊严，他们惊人的韧性成为书里最耀眼的光亮。

逐光而行，破茧重生。作者将个体故事编织成警世之镜，让读者从镜中看到熟悉的影子，进而去反思教育方式，审视家庭文化，这种看见、召唤与共鸣，正是解决问题的开始。教育的本质不是竞争比拼，而是守护生命的成长；让孩子健康成长，也不只是一个人、一个家庭的责任，更是整个社会的使命。愿我们都能带着书中的悲悯与勇气，成为那束光的一部分，用理解代替非议，用陪伴代替苛责，用包容代替偏见，用行动战胜冷漠，这是《要有光》带给我们的珍贵启示。

光，我们一起点亮

——读梁鸿的《要有光》

□李蔚超



在金元之交的北方文坛，有位隐逸高士以其远见卓识提携了后世公认的文学巨星——元好问，此人便是岢岚（今山西省岢岚县）奇士王中立。

元好问《续夷志》载：“王中立，字汤臣，岢岚人。博学强记，问无不知。少日治易，有声场屋。家豪于财，客日满门延待极丰腴，其自奉则日食淡汤饼一杯而已。年未四十，丧妻不娶，亦不就举，独处一室中如僧，如是三四年乃出。时人觉其谈吐高阔，诗画超绝，若有物附之者，问之不言也。”

清光绪版《岢岚州志》中亦记：“（王中立）负志奇伟，不乐仕进，尝曰‘予言有似泉鸣，出口人辄恶之’。有司屡荐不就，常避萧萧中，

歌采薇之诗。妻亡，不复娶，曰‘夫妇乃刚常大义，吾不欲纵欲以乱人道’。多与奇士游弹琴奕棋，终日坐茂林中，遇晚即卧木上。后卜芦芽山，结庐以居，更名云鹤，颇有商山富春之致，许衡视此，有愧色矣。”

金章宗泰和年间，元好问赴太原参加科考，途中听闻猎雁者讲述一对大雁生死相随的故事，深受触动，故作了一首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。其中写道：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！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处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：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横汾路，寂寞当年箫鼓，荒烟依旧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，山鬼自啼风雨。天也妒，未信与，



探源撷趣

《五马图》中看宋朝

□杭侃

北宋大科学家苏颂曾经两度出使辽朝，留下了《前使辽诗》三十首和《后使辽诗》二十八首。其中一首诗题为《契丹马》：“边林养马逐菜蒿，栈皂都无出入劳。用力已过东野稷，相形不待九方皋。人知良御乡评贵，家有材驹事力豪。略问滋繁有何术，风寒霜雪任蹄毛。”

苏颂在这首《契丹马》的下面还写了一个长长的题注：“契丹马群动以千数。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。纵其逐水草，不复羁辔。有役则旋驱策而用，终日驰驱而力不困乏。彼谚云：‘一分喂，十分骑。’番汉人户，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。视马之形，皆不中法相，蹄毛俱不剪剔，云马遂性则滋生益繁，此养马法也。”其中所说的“视马之形，皆不中法相”，意指契丹马不符合宋朝的相马法式，但又“终日驰驱而力不困乏”，所以引起苏颂的特别关注。对于良马的形象，宋人有自己的一套相马法，图之于形，可以以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作为代表。

《五马图》以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马，依次为凤头驄、锦膊驄、好头赤、照夜白、满川花。每匹马均有一人牵引，其中两人穿着西域服装、三人穿汉人衣服，人马均以单线勾勒，流畅而内敛，反映出高超的白描技艺。

这幅画在南宋时曾经归内府收藏，元、明两朝经柯九思、张彦发诸家递藏，康熙年间藏

于大臣宋莘家，乾隆时期作为祝贺乾隆生日的礼物入宫。这幅流传有序的名迹，后来经溥仪以赏赐溥溥的名义盗运出宫，流落日本，直至2019年重新出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主办的北宋书画精华展上。

在前所未有的写实手法中，悄无声息植入历史和想象

北宋李公麟最初以画马出名，他非常重视对马的观察，每次在皇家养马的太仆廐舍，“必终日纵观，至不暇与客语”。诗人曾在文章中写道，李公麟画完满川花之后，这四匹马不久便死了，“盖神骏精魄，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”，可见时人对李公麟画马艺术的高度评价。《五马图》技艺高超、传承有序，画上又有黄庭坚的跋语和曾巩的题跋，因此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《五马图》是李公麟的真迹。

宋代每匹官马都需造册，产地、身高、年齿、毛色是主要登记的信息。学者过去都认为《五马图》为纪实的职责题材绘画，不过，无论是签题还是图像表现，只能判断其中两匹马是异族贡马。签题表明，这两匹马分别由于阗国王和青唐地区的吐蕃部落首领董毡进贡，两匹马的牵马人也都是异族人相貌。好头赤题签称是“捺中秦马”，“捺中”即“捺选中

标”，“捺中马”是北宋政府对于御马的分类之一。彼时朝廷在边境地区集中买马，按照买马的区域可分为秦马和川马，“先是，茶马司设买马两务。一在成都府，市于文、叙、黎、珍等州，号川马。一在兴元府，市于西和之宕昌寨，阶之峰贴映，号秦马。”

有学者认为，《五马图》的所有视觉因素都意在营造一种“真实性”，可以说是对唐代韩干画马作品的再造，所以画中的围人（泛指养马的人）具有鲜明的唐代特点。但它并非韩干画作的“摹本”，而是用新的方式转化之后的“传统”——在前所未有的写实手法中，悄无声息植入历史和想象，从而有意模糊了历史与当代、客观描述与主观想象的边界。黄庭坚有诗称赞李公麟“李侯一顾叹绝足，领略古法生新奇”，大意是说李公麟看到韩干所画千里马后，经过领悟又创造出新奇的意象，《五马图》正是这种“新奇”的产物。

画中马依旧神采奕奕，但是宋人的精神不再健旺

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这样解释“马”：“怒也，武也。”马是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动物，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、作家布封说：“人类所要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，就是征服这豪迈彪

悍的动物——马。”虽然李公麟画中的马依旧神采奕奕，但是宋人的精神不再健旺，他们笔下马的造型因品种而异，大小、肥瘦、高低、毛色有别，但都温顺平和，眼神中布满忧郁。

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李公麟等人组成了一个艺术小圈子，时常以“马”为题相互唱和。苏辙在《韩干三马》诗中写道：“画师韩干岂知道，画马不独画马皮。画出三马腹中事，似欲讥世人莫知。伯时一见笑不语，告我韩干非画师。”苏轼在《又跋汉杰画山二首》中，借马提出了著名的“士人画”观念：“观士人画，如阅天下马，取其意气所到。乃若画工，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，无一点俊发，看数尺许便倦。”但观现存的宋画作品，很难看出马的“意气所到”。

有宋一代崇文偃武，马政衰微。苏轼在李公麟的另外一幅《三马图》上记述了这样一段史实：“（元祐初）时西域贡马，首高八尺，龙颅而凤膺，虎脊而豹章。出东华门，入天驷监，振鬣长鸣，万马皆惊，父老纵观，以为未始见也。然上方恭默思道，八骏在庭，未尝一顾。其后国人起居不以时，马有毙者，上亦不问。”马长八尺为龙，皇帝对待天马的态度尚且如此，大臣对待马政就更加懈怠。宋仁宗时期翰林学士承旨宋祁在奏章中指出“今天下马军，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”，他担心的并非马匹不够，而是嫌军马过多，宋祁认为“天下久平，马益少，臣请多用步兵”。连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参知政事范仲淹，竟也提出取消马匹贸易，“沿边市马，岁凡百万缗，罢之则绝戎人，行之则困中国”。

在这样的大环境中，就连苏轼也只能在《三马图》的残卷里感叹：“朝廷方却走马以粪，正复汗血，亦何所用？事遂寝。于时兵革不用，海内小康，马则不遇矣，而人少安。”在“马则不遇”的时代里，很难想象艺术家能画出时代的强音，即使是画家的才情再高。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。



宋·李公麟《五马图》(局部)

画说



弓淑英 作